

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孙志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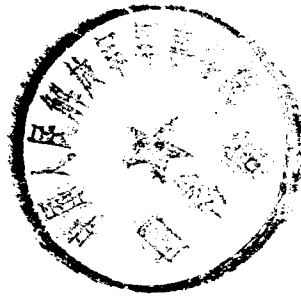
安徽人民出版社



2 037 8097 0

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孙志芳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2 合肥

责任编辑：童本道
封面设计：宋子龙

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孙志芳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5 字数：76,000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

统一书号：11102·37 定价：0.30元

目 录

一	前言·····	(1)
二	洋务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条件·····	(4)
三	李鸿章及其洋务思想·····	(17)
四	李鸿章主办的几个军事工业·····	(31)
五	李鸿章主办的几个“求富”企业·····	(47)
六	李鸿章创建的北洋海军·····	(78)
七	对李鸿章所办洋务“新政”的初评·····	(90)

一 前 言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它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前后持续三十余年之久，运动几乎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恩格斯指出：“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是受内部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①。洋务运动所以出现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不是偶然的。它的出现与消亡，归根到底，是中国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斗争的产物。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对洋务运动全部内容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和革命斗争发展的规律，而且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鉴戒中，更深刻地认识什么是中国工业化的正确道路，以及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问题。洋务运动的目的和主要历史作用都是反动的，这应该用材料和事实来加以说明和批判。然而，这和“四人帮”贩卖的影射史学却完全是两回事。十年动乱中，“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借批判洋务运动，疯狂诬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恶毒攻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以影射、比附和丑化的伎俩，肆意歪曲我党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项措施，拚命兜售其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货色。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罪行，肃清极左路线在史学领域的流毒，拨乱反正，

也需要对洋务运动进行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和研究，开展学术争鸣，以期做出正确的评价。

洋务派是洋务运动的积极推行者。在满洲贵族中，洋务派以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为代表。在汉族地主军阀中，则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代表。

由于满洲贵族的颟顸腐败，奕訢等实际上对洋务运动所起的作用并不大。汉人地主军阀中，曾国藩首先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1862年，他在安庆办起了第一个军械所，可以说是洋务运动重要发起人。但是，他在1871年就死了，办洋务的时间不长。左宗棠是湘系洋务派的首领。他在洋务运动的“自强”和“求富”阶段，都办了一些军用、民用工业，编练了新式海陆军，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推行者，不过，他也在洋务运动刚进入中期的时候，便于1885年死去。

在洋务派的汉族官僚中，只有李鸿章始终参加和主持这个运动。从“借师助剿”，购买外洋枪炮，揭开洋务运动的序幕，到1894—1895年中日战争，北洋海军覆灭，宣告洋务运动破产，迄未终断。他既是这个运动的倡导者，又是它的送葬者。他办的洋务最多，为时也最久。在以举办军事工业为中心的洋务运动第一阶段，李鸿章控制了主要的军工生产。在运动转向以办民用工业为主的第二阶段，他在开矿、航运、铁路、电报、纺织等业方面，也都是主要创办人。他又是清政府最大的一支近代化海军——北洋海军的创建者。正因为如此，在晚清统治集团中，他的权位日隆，成为参与决策清朝内政外交的重臣。

李鸿章所主办的洋务“新政”，是洋务运动的代表和重要组成部分。洋务派内部成员十分复杂，可以分成不同的派系和集团。这些不同的派系和集团，在对待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态度，对待民族资本，以及进行洋务运动的方针、办法上，都不尽相

同。洋务派在洋务运动过程中，也逐渐发生分化，有些人从洋务派中走出来，进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行列。但是，从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如筹办海防、兴办军用和民用工业等方面来看，李鸿章可以说是其中重要的角色和主要代表人物。

洋务运动与李鸿章的政治生涯密切关联，但是李鸿章的一生又不仅限于办洋务。他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的刽子手，是十九世纪后半叶清政府内政外交的重要决策人，他在创办洋务的几十年中，与资本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他反对戊戌变法，力主血腥镇压义和团运动。这本小册子，不是李鸿章传，对于他在办洋务以外的许多活动，不拟多所涉及，也不拟对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作全面评价。这本小册子仅就以下这几个问题，即李鸿章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成为洋务派的？他办洋务的思想和宗旨是什么？他所主办的军用、民用工业和编练的北洋海军，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怎样？他所办洋务最终破产的原因是什么？根据一些具体材料，进行初步分析，试对洋务运动的一部分进行探讨和研究，以就正于史学界的前辈和同志们。

在该书编写过程中，我学习了史学界一些同志有关洋务运动的著作和文章，从中受到不少启发，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注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3页。

二 洋务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条件

(一) 洋务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

洋务运动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兴起的。要考察与研究洋务运动，首先必须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说起。

在国际上，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美等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地确立，产业革命已经完成。资本主义正处于自由竞争的黄金时代。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①然而生产力的大发展，生产的日益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发生日益尖锐的矛盾。好象瘟疫般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制度带来极大的威胁。资产阶级为了逃避危机的袭击，“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②它们把侵略的触角竭力伸得更远更远。用贪婪的目光窥伺着整个世界。幅员广大、资源丰富而古老落后的封建中国就成为资本主义列强掠夺侵略的主要对象。

商品、鸦片和大炮就成为它们侵略中国的主要手段。1840年，由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所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打败了社会制度腐败，军备落后的清朝，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古老的中国关闭着的大门，开始被西方资本主义的重炮轰开了。接着，从1856年到1860年，为了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攫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以便迅速打破中国社会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把中国开拓成为他们最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给地，英法两国组织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美俄同时趁火打劫，敲诈勒索，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又一批不平等条约。从此，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势力升堂入室，急剧扩张起来。

经过两次西方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之后，尽管清朝统治阶级中最腐朽顽固的势力，仍在高唱“天朝上国”、“神威远震”的老调，藉以自欺欺人。但是，严酷的现实使得统治阶级中另一部分人开始感到“闭关政策”已经破产，形势逼人。他们不能不承认，这些远涉重洋而来的外国人确实有所长，感受最突出的便是这些国家船坚炮利，工商发达，国力强盛。清朝则相形见绌，财政空虚，军事腐败，已穷于应付昔日视为蛮夷番邦之国的侵扰了。他们认为，在这些方面要向洋人学习，应该“实力讲求，随时整顿，日有起色，俾不至为外国人所轻视，方可消患未萌，杜其窥伺之渐。”^③他们在灭亡的恐怖心理之下，被迫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来应付急剧变化的世界局面和潮水一般涌来的西方势力，以求得清朝这只封建主义的大船不致在惊涛骇浪中沉没下去。所以，洋务运动的产生是和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刺激分不开的。

正当西方资产阶级野心勃勃地在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

个世界”^④的时候，中国却仍然封闭在封建社会之中。这个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年之久，现在已经完全腐败了。封建的生产关系早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沉重的地租、田赋和高利贷的剥削，土地兼并和贪官污吏的搜刮，造成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鸦片战争以后，又增加了西方资本主义强盗蛮横的掠夺。鸦片弛禁，洋货涌入，白银大量外流，使社会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君临中国的清朝统治者，这时早已越过了他们的“康乾盛世”；正在走向衰败没落之途。他们不仅陷入历代封建王朝多次重演的衰落危机之中，还走到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临近灭亡的末路。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官僚主义的统治机构，已经腐烂到百弊丛生，几乎失去统治的能力。从皇帝以至文武百官，除了以追逐荒淫奢侈的生活和鱼肉人民为能事外，大多昏庸愚昧，麻木不仁。他们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嘉庆皇帝时，中外贸易集中地的广州，有人出版英汉字音对照，竟然也横遭官吏的禁止，所以，更不用说调查研究外国的历史和现状了。他们夜郎自大，闭目塞听，认为了解西方的情况有失天朝的体面，企图用避免和限制与外人接触的闭关锁国政策，来阻挡潮水般向东方推进的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结果必然遭到连续的失败。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了偿付赔款和弥补因鸦片大量输入，白银恶性外流所造成的财政困难，变本加厉地对人民搜刮。结果地丁田赋猛增。加之官差胥役又借催征粮税巧取豪夺，更进一步激化了国内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太平天国革命就是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交织下爆发起来的。这场农民革命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两年的时间，就从广西山村一直打到了长江下游的重镇南京。它建立起农民的政权，

颁行了以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为中心的《天朝田亩制度》，进行了北伐和西征。太平军的斗争鼓舞了捻军、小刀会和西南、西北少数民族的起义，浪潮澎湃，汹涌激荡，清王朝几乎被淹没在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农民起义军的铁拳捶击下，满汉地主阶级真正感到了他们统治力量的空虚。尤其是军队腐败，武备落后，不仅八旗兵、绿营兵不堪一击，就是刚刚编练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地主武装，虽然号称精锐，但也常常被起义军打得落花流水。为了渡过危机，消灭发、捻，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统治者便决定采取和资本主义列强进行军事合作的政策，来镇压人民起义。他们借用外国的军队，购买外国的枪炮，继而设厂仿制新式军火武器，用来武装湘、淮军和中央以及各省的军队，以屠杀起义者，维持反动的统治秩序。洋务运动的幕幔就是在中国反动派携手剿杀农民起义的枪炮声中拉开的。

（二） 洋务运动产生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条件

如上所述，内忧外患的压力，使得清朝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认为，必须寻找新的手段，进行自救，以图“中兴”。洋务运动就是适应这种政治需要而开展起来的。但是，还应看到，除了清朝统治者这种主观的需要之外，洋务运动的兴起还有其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条件。

中国自明清以来，在封建社会内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尽管由于受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极为缓慢，但是，它仍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

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例如在丝织、制茶、造纸、陶瓷、酿酒和采矿等行业中，已出现了手工业工场，工场里雇佣的工人少的数人，多的达几百人。它是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之间的联系环节。虽然这些资本主义萌芽，在鸦片战争以后，大部分因受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打击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摧残沦于衰败停滞。因之很少直接发展成现代的资本主义工业。但是，它却在生产技术水平和生产管理方面，为洋务运动时期所开办的近代工业准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除了民间兴办的工场手工业外，还有由封建官府经营的手工业工场。这种工场发展到十九世纪，规模比前者更大，生产水平也更高一些。就生产关系来讲，它不象民间手工业工场那样，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它的存在和发展，也给洋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技术等条件。洋务运动首先是从兴办新式军火工业开始的。这时，旧有的官府军事手工业，如京营神机营、火器营以及各地制造军器火药的“军械所”、“火药局”等，相继参与仿制西式武器。不少旧有官府军事手工业工人，则在他们已有的技术基础上，改而从事新式枪支弹药的生产。只是在管理制度上，洋务派主办的军火工厂仍沿用不少封建官府军用手工工场的制度。此外，洋务派经营的采矿、炼铁等工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受了官府手工业的封建传统的影响。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分解和商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这就为洋务运动开办新式工业准备了劳动力，开辟了商品销售的场所。1840年以后，在鸦片大量输入的同时，物美价廉的洋纱、洋布大量输入中国，逐渐排挤土布、土纱。中国传统的手工业纺织业遭受很大的破坏。此外，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洋铁、洋钉、火柴、煤油等项，进口数值急剧增长。中国的生丝、

茶叶则被贱价掠夺出口。中国广大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城市小手工业者纷纷破产。与此同时，买办商人和高利贷资本的活动深入农村，更使农村自然经济加速分解。中国农村经济逐渐改变了长期自给自足的状态，逐步卷入交换过程，无论出售产品还是买进原料和消费品都与市场发生了日益密切的关系，这就为洋务运动，特别是第二阶段民用工业的兴办，开辟了销售商品与供应原料的市场。而高利贷资本和买办商人对农民的盘剥，加速了土地兼并过程，广大农民因失去土地流落四方，破产的小手工业者，也不得不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一切为近代工业的兴办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市场。

此外，在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侵略者为了便于对华输出商品和搜刮原料，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开办了船舶修理厂和出口原料的加工工厂，如缫丝厂、制茶厂等，从这些工厂里诞生了中国近代第一批产业工人。1863年以前，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厂企业已有二十六家，其中船坞、船厂十家，机器铁厂有三家^⑤。这些工厂雇佣的中国工人少则数十，多则数百，他们是中国第一批掌握机器生产技术的工人，其中一部分后来就成了洋务派办工业的技术力量。例如，1863年李鸿章开办的苏州炮局，其中一部分技工便是从外商工厂来的。李鸿章开办的江南制造总局，一部分工人也是从所收买的美商旗记铁厂中转来的。

总之，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批产业工人的出现，也都为洋务运动的兴起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洋务运动的发生还有它的思想条件。1840年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之下，在汉族地主官僚士大夫中，已开始有人睁眼看世界，他们从挽救国家民族的积弱积贫出发，提出

了向西方学习，改革弊政，富国强兵的主张。魏源、冯桂芬等人的思想即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作为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的先河，影响着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思想界。洋务派的政治立场和主张，特别是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侵略者的问题上，与魏源等人大不相同。不过洋务派从适应国内外变局的需要出发，也吸收了魏源、冯桂芬等人思想中的某些内容，构成他们自己的“中兴”方案。

魏源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与维新思想的先驱者——龚自珍、林则徐等人研讨经世致用之学。他们主张严禁鸦片贸易，坚决抵抗英国的侵略。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对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思想，不满于清廷腐败现状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深刻的刺激。民族的危难促使魏源认真地去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他认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况”。从这一认识出发，他注意对世界情况的调查了解。1847年，他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又参考多种中西著作，编成《海国图志》六十卷。这一长篇巨著，介绍了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历史、地理和社会情况，同时提出一套对付外国侵略者的战略、策略。魏源认为，要战胜侵略者，不仅要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人民，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还必须改进中国落后的武器装备和“养兵练兵之法”。为此，就要“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才能变落后为先进。他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在分析敌我双方军事上的优缺点的基础上，指出：

“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⑥他主张在中国设立兵工厂和造船厂，聘请西洋技师，学习西方制造新式武器。后来，他又从仿造外国军舰到主张自造商船，从仿造新式枪炮到主张自造民用机器，要求允许私人设立厂局，制造轮船、器械等自行出售。他批判了那种把外国的一切机器

制造都斥之为“奇技淫巧”的守旧思想，阐述了“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的道理。

魏源“练兵”、“制器”的主张，对于洋务派有很大影响。洋务派从维护清朝反动统治出发，也主张学习西方生产技术，特别是制造新式武器。曾国藩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提出要“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李鸿章在创办江南制造总局时也说，要“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1875年，左宗棠为重刻魏源《海国图志》一书写了一篇序言，更明确指出：“同、光间，福建船政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造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⑦可见洋务思想和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在某些方面有相同之处。当然，他们之间也有不同的地方，洋务派缺乏魏源那种坚定的爱国主义的反侵略立场。他们中的很多人，如李鸿章等，虽然也将“制夷”挂在嘴边，但是并没有制夷的胆识与决心。因此，在实际行动中，便一步步地由“崇夷”、“惧夷”而“媚夷”、“降夷”了。

在魏源稍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冯桂芬的思想给洋务运动的影响更为直接。冯桂芬目击清朝内忧外患的加深，于1861年写成一部以革新封建统治为内容的政论著作——《校邠庐抗议》，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冯桂芬根据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初步了解，指出当时的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⑧。他认为中国要想独立富强，首先要“采西学”、“制洋器”，也就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才能有效地打击外来的敌人。冯桂芬是地主阶级改革派，他的思想并没有超出封建主义传统思想的范围。在他看来，封建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正统，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应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前提。这就是要在中国封建制度的基础

上，用“西学”、“洋器”来补苴罅漏。所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⑨，这便是冯桂芬改革思想的核心。这种思想对洋务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张之洞把它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实际上就是从冯桂芬“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演变而来的。冯桂芬曾在李鸿章那里当过两年幕僚，对李鸿章个人的思想影响更是不小。随着历史的发展，洋务派由于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场。在侵略者“打”、“拉”兼施之下，媚外崇洋的思想日益严重，而以林则徐、魏源为先驱的中国近代维新思想则始终保持着爱国与追求进步的风貌，日益鲜明地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方向发展，代表了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要求，从而，与洋务派之间的思想分歧就日益扩大而走向对立了。

（三） 洋务派的形成

洋务运动是由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洋务派来提倡和推行的。洋务派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新产生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中不少人是由于顽固派转化而来的。这个政治集团在外由于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支持，在内则得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重用，从而逐渐掌握军政实权，后来居上，成为晚清当权派中最有实力的政治集团。它的产生和发展和中国向半殖民地道路转化有关，也和资本主义列强势力侵入中国的政治领域有关。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封建统治者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双方相互有了新的认

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看到，清政府在他们的“炮舰政策”之下已经开始变得驯服起来，可以作为他们奴役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而英勇无畏的中国劳苦大众却是它们侵略中国的严重障碍。因此，为了帝国主义的侵华利益，就必须给风雨飘摇的清政府以有力支持，利用清朝政府，建立稳定的半殖民地统治秩序。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就曾明白表示：“新的东方问题之可能发生，是由于中国（按指清王朝）的衰弱，而不是由于中国的强大。”他们决定帮助清王朝渡过人民大起义的难关，把这只即将沉下去的大船救起来，以便“通过满清朝廷而制造出一种适合他们的利益的政府”^⑩。因此，在北京条约签字的宴会上，这一伙资本主义强盗便装出一副友好的面孔，纷纷向清政府表示，愿意“助顺剿贼”。俄国公使声称，俄国愿意派遣海军进攻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法国公使正式表示，愿意助平“匪乱”；俄国公使又代表美国商人，要求帮助清政府从海路运漕米进京，解决京城因战争封锁而产生的粮食恐慌。一句话，外国侵略者们在获得一大批新的侵略果实之后，对清政府的政策暂时由“打”变为“拉”。

外国侵略者态度的改变，使清朝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对资本主义列强的认识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英法联军占天津，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的行动，使他们惊魂未定，余悸犹存，对洋人产生畏惧心理；另一方面，北京条约签订，联军撤退，内部统治秩序并未变更，列强反而有“助顺剿贼”的表现，又使他们对侵略者产生好感和幻想。因而主张应和列强搞好关系，以争取其军事上的帮助，引进西方精良的武器，强化清朝的武装力量，使清朝统治能够转危为安。

这种认识的代表，在满洲贵族中有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文祥等人。奕訢是皇室亲贵，本是顽固派。第二次鸦片战